

屈原的心灵发展及其文化背景

巩 本 栋

研读《离骚》，我们都会发现其思想艺术上有一个十分显著的特点，即诗的前半眷念追悔，悲愤怨嗟，萦回复沓，势不得隐，流露出一种深广的忧患意识和沉郁怨愤的情怀意绪，真实地揭示出诗人当日的楚国社会现实，具有深刻的现实主义创作倾向。而诗的后半结想宏富，场面阔大，意象瑰玮，强烈地反映了诗人对自己政治理想的执着追求，体现出诗人卓异不凡的气质和才情，突出地展示了奇特绚烂的楚文化艺术特征，更多地表现出积极浪漫主义的创作特色。促成这一变化的原因在哪里呢？我们认为，这就在“退将复修吾初服”与“就重华而陈词”之中。通过退修初服与陈词重华这两条途径，诗人摆脱了哀怨苦闷、徘徊犹疑的心理困境，继续奋然前行，上下求索，从而给全诗的思想艺术带来了重大转变。

首先，是退修初服给了诗人摆脱心理困境的力量。诗人出身楚国贵族，祖先曾任要职，易于使诗人心理上产生一种优越感、自豪感；诗人自己“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即《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所谓“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使诗人有自洁、自信之感；加之当日所处的楚国，虽不免已内里空虚，但毕竟还算强大，楚怀王也曾信任贤能，诗人才得以官至左徒，能够“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1]这更使诗人内心增添了欲有为于国的无限信心和力量。然而，这一切优越之感、宏伟之

愿、自信之心，在“谗人间之”、“王怒而疏屈平”的情况下一旦毁灭，昔日的优越感、自信心与热望，迅速转化为失落感、惶恐与失望，犹疑、徘徊，形成了彼时彼地诗人的心理境况。但同时，也正是这种处境，逼着诗人不能不回首瞻顾自己所走过的道路，检查自己以往的言行，思忖和正视严酷的社会现实；使诗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渴求理解、支持，更期望得到心理上的抚慰、肯定和补偿。

于是，失路彷徨的诗人写道：“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并进而对自己的“退修”作了一番象征性的描绘：“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这样，经过一番认真的“退修”，诗人的心境已逐渐发生转变。比如，诗人说：“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这显然已是痛定思痛之后的自解、自慰，其情感决绝，已不同于前之“苟余情其信姱以练要兮，长顛颛亦何伤”。而“芳与泽其杂糅兮，唯昭质其犹未亏”一句，则是诗人从“退修”中再次感到遭忧被疏的责任并不在自己，诗人问心无愧，而且，既然是“唯昭质其犹未亏”，那就理所当然地应为所用，能为所用，这也就是后半部分诗中“苟中情其好修兮，又何必用夫行媒”的意思。由此可见，此时的诗人内心重又充满了自信，充满了希望。所以，诗人也才写出了“忽反顾以游目兮，将往观乎四荒”的诗句。王逸注曰：“言己欲进忠

信，以辅事君，而不见省，故忽然回顾而去，将遂游目往观四荒之外，以求贤君也。”王夫之亦曾指出：“忠贞之士，处无可如何之世，置心澹定，以隐伏自处，而一念忽从中起，思古悲今，孤愤不能自己，固非柴桑独酌、王官三休之所能知类若此夫。”^[2]这一变化正兆示着诗人将从忧怨彷徨的心理困境中解脱出来，恢复自信，继续坚持自己的理想并为之不懈奋斗，尽管接着诗人又写到女嬃“申申其詈予”，但他已决不会为其所动了。

退修初服是诗人心理转变的一大关键，但仅仅是“退修”，仅仅是情感上的自我审视、肯定和抚慰，还不足以使诗人最终摆脱心理困境，他要进而作理性的思索，从思想上求证，即“依前圣以节中”，以“得此中正”。这就是要以前代君臣的遇合成败，国家治乱的史实，来检验和评价自己的志行，比照楚国的政治现实，同时也含有司马迁所说“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3]的意思，其途径便是“就重华而陈词”。

在这段慷慨的陈词中，诗人历数夏殷两代君臣逸豫淫乱，倒行逆施，自戕自灭的乱行，称举禹汤文武遵循法度，举贤授能，国家强盛的治绩。褒贬分明，对比强烈，情感愤激。于是，诗人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夫孰非义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显然，此时诗人的情感已经超越对楚王的怨嗟、斥责，他是在对整个楚国的黑暗现实进行理性的批判，对自己所处的那个时代不满、不平，同时也是对自己所追求的“美政”的再评价、再肯定。至此，诗人那颗伟大而寂寞的心灵，终于跨越了时空界限，在“唯义为可用，唯善为可行”^[4]的历史规律上，与前修契合了。这样，诗人虽然仍“曾歔歔余郁邑兮，哀朕时之不当”，但心里毕竟已“得此中

正”了，而这正意味着诗人最终从忧怨、抑郁、彷徨的心理困境中摆脱出来，在更高的情感层次上，即在超现实的想象中，继续进行自己的伟大政治追求。

所以我们说，退修初服固然是诗人在“进不入以离尤”的情境下所做出的抉择，是迫不得已之举，但通过退修初服，诗人心中失落了的东西得到了补偿，自我价值再次得到认可，政治理想也更明确坚定；同样，陈词重华固然是诗人“不周于今之人”而不得不从前修那里汲取力量、寻求支持的心理途径，是诗人命运的悲剧，但经过这番痛切的陈词，诗人“耿然自觉，吾心已得此中正之道，上与天通，无所间隔。”^[5]“无往不自得”了，从而在心理上终于完成了由忧怨、抑郁、彷徨向坚定自信、明朗宏阔的转变。这时，诗人情感随之升华。他的内心重又充满了对所抱政治理想的自信和实现理想的希望，由于这种希望在诗人心中凝聚、积淀已久，受到楚国黑暗势力的压迫而难以在现实中实现，所以，一当它再次充溢于诗人心中，也就较前更为强烈、执着和积极。诗人在这种强烈情感的驱使下，在明朗宏阔的心境中，进一步激发出丰富的想象力和卓越的艺术创造力，原先所使用的艺术手法和形式已不足以表现和容纳，在“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心灵远征中，诗人把最为生动鲜艳，只有在原始神话中才能出现的那种无羁而多义的浪漫想象，与最为炽热深沉，只有在理性觉醒时刻才能有的个体人格和情操，最完满地溶化成了有机整体。由是，它开创了中国抒情诗的真正光辉的起点和无可比拟的典范。从而也就构成了全诗思想艺术上的前后变化。

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是，在屈原心灵发展转变的过程中，他何以会选择退修初服和陈词重华这两条途径，这种选择何以会给屈原如此巨大的精神力量？屈原这种选择的现实

意义和深层心理文化背景又是什么？

《离骚》的创作是在屈原被楚怀王疏远之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曰：“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班固《离骚赞序》、王逸《楚辞章句》亦皆指出《离骚》作于屈原被疏之后。同时，从《离骚》本身的内容看，诗人称楚王为“灵修”、“哲王”，担忧“皇舆之败绩”，希望能重新为楚怀王“导夫前路”，这些显然都是诗人被疏后不久，对楚王仍眷眷以顾，抱着很大的期望时的语气，而非被顷襄王所“放”，“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6]时的口吻。

《离骚》作于屈原被疏之时，而屈原被疏的原因，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所载，主要是由于上官大夫的谗言，即所谓“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为‘非我莫能为’也。”这种谗言显然是对屈原人格的诬蔑和对其行为的歪曲。因此，屈原被疏后心灵的发展变化历程，也很自然地会从“退修初服”开始，进而陈词重华，求证于先圣，以见出自己人格的高尚和所作所为（如其“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等等）的正确，以期冀得到楚怀王的重新任用。这就是屈原选择退修初服、陈词重华这两条途径的较为直接的原因和现实的意义。

屈原的退修初服和陈词重华，在当日又有着深刻的心理文化背景，即先秦诸子，无论是老庄还是孔墨孟荀，他们一方面无不注重修身——自身的精神修养和锻炼，以期于世所用，在事业上有所成就；另一方面，他们又大多推尊先王，各为所用。由此构成了一种深厚而强大的心理积淀和文化态势。

老子谈到“善建”、“善抱”之道说：“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有余；

……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7]把修之于身作为修国、修天下的起点和前提。《庄子·外篇·天道》中说，士成绮问老子问如何修身，老子没有正面回答他，却不客气地指出他在修身方面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如“而容崖然，而目冲然”等。因为，他主张修身治物必须遵从自然无为之道，所谓“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治物，以此修身。”而士成绮恰恰违背了这一点。这当然也代表着庄子一派的想法。

墨子最注重行，说“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但怎样才能“行”成，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又认为应从修身开始。他说：“君子察迹而迹修者也，德不修，行见毁，而反之身也。”^[8]并指出：“今士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世之君子欲其义之成，而助之修其身则愠，是犹欲其墙之成，而人助之筑则愠也，岂不悖哉？”^[9]都是强调修身有助于“其义之成”。

相比较而言，诸子中最重修身的还是儒家。因为他们总是自以为“任重而道远”，需要特别注意修身自持，否则便难以担负起将来的重任。《论语·宪问》：“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从修己始，以安百姓终，修己成为实现安百姓的政治理想的基础、必要条件和手段，这与孔子曾反复强调过的“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都是一个意思，鼓励弟子努力修养锻炼，以求用世。

孔子之后，孟子、荀子对修身作了更明确、更进一步的论述。孟子提出：“守约而施博，善道也。……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

下。”^[10]后来，荀子说：“以修身自强，则名配尧舜。”^[11]“闻修身，未尝闻为国也。”^[12]提到了更高的地位。

由此可见，注重修身本是先秦诸子共同的思想观念和普遍品格。屈原作为一位曾“入则与王图议政事，决定嫌疑；出则监察群下，应对诸侯”的杰出政治家，作为一位处身于这样一种自由活跃的文化氛围中的伟大诗人，当然不能不受其深刻影响（主要是儒家修身思想的影响）。他在诗的一开始就多次写到：“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对自己的内美修能作了形象极美的描绘。

（同样的描写还见于《桔颂》、《涉江》等作品）诗人如此反复强调、苦苦追求品行和德才的修养锻炼，自然也是期望为君所用，即蒋骥所云：“所修无已，善行乃日进而不可变。此立身之本，而致君之源也。”^[13]尤为可贵的是，当诗人陷于“进不入以离尤”的情境，仍反身自求，“退将复修吾初服”，而且通过一番退修初服的心灵磨练之后，诗人确又奋然前行了。因此，正是从这些地方，诗人向我们表露出其无论穷达都要兼善天下之心；正是从这些地方，已向我们揭示出退修初服在诗人心灵发展和转变中的重要作用。

先秦诸子多推尊先王的思想影响，则是构成屈原陈词重华的另一重要心理动因。《庄子·盗跖》中有尧舜禹汤文武“此六子者，世之所高”的话。这虽是所谓盗跖对孔子的斥责，是异派之间的相互攻击，是对贵古贱今思想的批判，却也说出了尧舜禹汤等先王在世人心目中的地位，在当时已经很高。（不过，他们心目中的先王概念并不完全一致，此且不论。）所以，墨子主张尚贤，与人论辩就喜欢“考先圣大王之事”^[14]。道家虽认为古人生活在混茫之中最好，伏羲、黄帝、尧舜等一代不如一代，

其实这仍是一种崇尚先王的反映。法家也崇尚先王圣人，不过这个先王主要是黄帝。至于“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儒家之士，更是每事好称先王。这不仅在《论语》、《孟子》中多有记载，而且从先秦其他士人的言论中也可看出来。如，《庄子·人间世》托词颜渊说：“成而上比者，与古为徒，其言虽教，谪之实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虽直而不病。是之谓与古为徒。”成玄英疏：“忠谏之事，乃成于今；君臣之义，上比于古，故与古之忠臣比干等类，是其义也。”又曰：“夔古以来，有此忠谏，非我今日独起箴规者也。”从屈原之陈词重华所表现出的思想情感来看，可以说正与儒家和先秦其他士人推尊先王的观念相通。王国维曾指出：“屈子南人而学北方之学者也。……虽南方之贵族，亦常奉北方之思想焉。观屈子之文，可以征之。其所称之圣王，则有若高辛、尧、舜、禹、汤，……贤人则有若皋陶、挚说、彭咸、比干、伯夷，……暴君则有若夏启、羿、浞、桀、纣，皆北方学者之所常称道。”^[15]“北方之思想”主要应指儒家思想，但又不限于儒家思想，王氏之论可谓精到。

在上述思想文化背景衬托之下，也由于诗人“明于治乱”的政治家气质，他更易于在思想上与时人称举尧舜的习惯合拍，对历史上君臣离合与国家治乱之迹更敏感熟悉、更有监察力。所以，在诗的前半部分，诗人屡屡申言“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退修初服之后，更有了向重华陈词的大段申诉。这样，“法夫前修”，不但实际上已成为诗人政治理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与前代圣王贤臣契合的想象中，也融入了诗人期望再为楚王所用的苦衷。由此，这才能给诗人以精神力量，使其最终摆脱心理困境，坚持自己的政治追求。

总之，退修初服与陈词重华，其所以能在诗人的心境转变中起重要作用，如果仅仅归之于表层意义上的诗人好修的思想特征、政治家的气质和生活遭际的逼迫，或者泛泛地归之于爱国主义思想的影响，甚至归之于儒家思想的影响，显然都还不够。因为，不论是退修初服还是陈词重华，其中都深含着先秦士人以道自任、注重自身修养锻炼的思想文化的意蕴，铭记着国家治乱、社会沉浮的前车之鉴对诗人心理影响和支配的印记，正是有赖于这种长期凝聚、积淀的深层心理文化因素，以及对诗人内心的潜在影响，有赖于对历史发展、民族盛衰的深重的忧患意识，诗人才自觉不自觉地将民族与个人、历史与现实在深层心理上紧密地联系起来，并主要地靠着这种深潜意识的巨大力量，在困厄之际支持、推动了诗人心理的发展，决定了诗人的命运，而退修初服和陈词重华不过是诗人心中这一深潜意识的两种表现途径而已。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诗可以怨”，“诗穷而后工”，自然都是伟论，但假如诗人只是限于写怨写穷，而不能冲出忧怨情感的漩涡，摆脱心理困境的束缚，从忧怨中奋起，从个人穷通中超越出来，开拓心胸，去进行更高情感层次的追求，那就势必如鲁迅先生曾指出过的，“若其怨愤责数之言，则三百篇中之甚于此（指《离骚》）者多矣”^[16]，即使有可资借鉴的南方文化的创

作因素，《离骚》也未必能放射出如此“惊采绝艳”的积极浪漫主义的光彩，更不用说什么“衣被词人，非一代也”。屈原之所以伟大，《离骚》之所以不朽，不仅在于诗人抒发了自己虽“独穷困乎此时”，却仍然“忍而不能舍”弃对理想上下求索的伟大爱国主义思想；表现了其虽处“进不入以离尤”之境，仍要“退而复修吾初服”，继续奋然前行的可贵品质；也不仅在于诗人创造性地运用浪漫主义手法所作出的那些意象缤纷、风格宏丽的奇特描绘，而且还在于，诗人具体生动、深刻鲜明地再现了自己内在心灵中忧怨抑郁、犹疑徘徊的心理困境，以及诗人自己怎样从困境中摆脱出来，继续坚定执着地进行自己伟大追求的全部过程。

注

- [1]、[3]、[6]、《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 [2]、王夫之《楚辞通释》卷一。
- [4]、[5]、朱熹《楚辞集注》卷一。
- [7]、《老子》五十四章。
- [8]、《墨子·修身》。
- [9]、《墨子·贵义》。
- [10]、《孟子·尽心》上、下。
- [11]、《荀子·修身》。
- [12]、《荀子·君道》。
- [13]、蒋骥《山带阁注楚辞》卷一。
- [14]、《墨子·非命下》。
- [15]、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
- [16]、鲁迅《汉文学史纲要》。

责任编辑 韩云波

(上接63页)社会责任感与利他行为都呈正相关。生活的实践证明，只有正义感强烈，是非清楚，有正确的人生观，具备高度社会责任感，把社会和别人的需要当作自己需要的人，才能有强烈的利他动机，当别人需要自己时挺身而出。所以，教师应该加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解决他们的利他行为的内部动机问题，使其成为学生的一种内在观念和内心需要。

以上我们对学校培养学生的利他行为进行了一些探讨。应指出，学生利他行为的产生发展，受内外多种因素的影响。只有社会、学校和家庭三方面共同合作，协调一致，形成统一的德育网络，才能使学生的利他行为内化为不易改变的良好品德。

注

-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
-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4页。
- [3]、《列宁全集》，第31卷，第104页。
-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34页。
- [5]、《列宁全集》，第6卷，第463页。

[6]、苏霍姆林斯基著，杜殿坤编译，《给教师的建议》（下），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05页。

[7]、[8] 李辽《青少年移情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心理学报》，1990年，第1期。

责任编辑 李绍东